

《江南傳教史》同名異文述論

譚樹林

[提要] 晚清暨民國時期出現兩部名為《江南傳教史》的教會史著作，兩書均用法語寫成，著者均為法國來華耶穌會士，且在教會內部和學界均享有盛譽。二者雖同名為《江南傳教史》，卻在很多方面顯著不同：就撰著緣起而言，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屬“私人著述”，從未得到上級的正式許可，而史式徽的《江南傳教史》則是奉命而作；從敘述的歷史時期看，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起自晚明，止於1898年，堪稱一部中國天主教史，而史式徽的《江南傳教史》起自1839年，止於1898年，且僅限江南地區，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江南地區傳教史；就學術風格而言，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全書沒有注釋，且充滿想像和傳說，而史式徽的《江南傳教史》引證確鑿，但缺乏細節描寫，在保存史料方面比高龍鞏之《江南傳教史》稍遜一籌。

[關鍵詞] 《江南傳教史》 高龍鞏 史式徽

[中圖分類號] B97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7)02-0175-11

晚明以降，伴隨天主教的傳播，大量天主教文獻在中國刊刻出版。它們或為外國傳教士獨自撰寫的西文宣教文獻，或為外國傳教士與華人助手聯袂著譯的漢語基督教文獻，或為奉教士大夫、容教（有的稱為“友教”）以及仇教人士撰述的護教或反教文獻。在這些文獻中，曾出現同名異書（文）之現象。明末清初，即出現過同名《天學傳概》的兩種漢語天主教文獻：一為晚明士人黃鳴喬所撰，刊刻於1639年；一為清初著名天文學家、曾任欽天監夏官正的李祖白於1664年所作。^①迄至晚清暨民國時期，又有兩部同為《江南傳教史》^②的教會史著作出現：兩書都是用法文寫成，著者均為耶穌會士，亦均為法國人，即高龍鞏（Auguste Colombel）和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ère）。雖然兩書名稱同為《江南傳教史》，均在教會內部和學術界享有盛譽，但“兩部《江南傳教史》不論在敘述的歷史時期和學術的風格上都有很大差異”^③。鑒於以往學者對這兩部《江南傳教史》鮮有專論，^④本文掇拾相關史料，擬對兩部《江南傳教史》之撰著緣起、內容與影響進行探究。

一、江南傳教區沿革與《江南傳教史》撰著之緣起

江南傳教區又名“江南代牧區”，其歷史最早可追溯至晚明時期。1599年2月，耶穌會士利

瑪竇 (Matteo Ricci) 第三次來到南京，從南京工部員外郎劉冠南手中購得位於正陽門內洪武岡崇禮街西營的工部宅邸，建立了天主教在江蘇的第一個教堂，^⑤天主教由此開教南京。次年，教徒就達 100 餘人。1603 年，徐光啟在南京由葡籍耶穌會士羅如望 (Jean de Rocha) 神父施洗，正式皈依天主教。兩年後的 1605 年 3 月，常熟名紳瞿太素也在南京受洗入教。1616 年，“南京教案”爆發，義大利籍傳教士王豐肅 (Alfonso Vagnoni, 又名“高一志”) 等被押解至澳門，教堂被毀，南京教務的發展受到極大影響，直到 1628 年葡萄牙籍傳教士陽瑪諾 (Emmanuel Diaz)、義大利籍傳教士畢方濟 (Francesco Sambiasi) 來到南京，教務逐步得到恢復。至 1658 年 (清順治十五年)，南京已成為中國天主教的教務中心。1659 年 9 月 9 日，羅馬教皇下詔設立中國北部代牧區，代牧主教駐南京。1660 年，羅馬教廷傳信部在中國推行宗座代牧制，從澳門教區分設南京宗座代牧區，將代牧的任命權從葡萄牙手中變相收回。1676 年，教皇克雷芒十世任命中國籍傳教士羅文炤^⑥擔任宗座代牧，1685 年晉升為主教，他因此成為歷史上第一位中國籍主教，也是 1926 年以前由教廷任命的唯一一位中國籍主教。1690 年 4 月 10 日，教皇亞歷山大八世決定設立南京主教區，管轄江蘇、安徽和河南等地教務，置於果阿總主教和葡萄牙保教權之下。^⑦1696 年 10 月 15 日，教皇英諾森十二世頒佈諭令，南京主教區的轄區限於江南省和河南省。禮儀之爭後，南京主教區的教務受到極大影響。1773 年耶穌會在歐洲被取締，南京教區主教改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和遣使會會士擔任，法國教會在江南教區的勢力藉此得以加強。1844 年中法《黃埔條約》簽訂後，許多法國耶穌會士來到江南傳教區。1856 年 1 月 21 日，羅馬教廷將南京教區改為江南代牧區，轄江蘇、安徽兩省，主教駐上海，交由耶穌會巴黎省管理，從此，法國耶穌會士在江南地區居於主導地位，“近代江南地區天主教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法籍耶穌會士在上海、江蘇、安徽傳教的歷史”^⑧。

天主教會歷來就有注重修史的傳統。天主教廣為傳播後，出於總結傳教經驗、彰顯傳教業績之考慮，撰寫年度傳教報告、乃至為傳教區修史，成為各修會和傳教會頗為重視之工作。江南傳教區作為天主教在華教務較為興盛的區域，尤其是 1864 年太平天國覆滅後，江南教區進入了一個平穩發展的階段，與當時其他傳教區教案頻發相比，江南教區相對太平，教務開展亦頗為順利，這種形勢使江南傳教區具備了修史之條件。

最早撰寫江南教區傳教史者為法籍來華耶穌會士費賴之 (Louis Pfister)。費賴之，字福民，1852 年加入耶穌會，1867 年至中國。在學習漢語、從事傳教的同時，注意蒐集江南教區的傳教資料，他用法文寫成的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Chine: Le Kiang-nan en 1869* (《耶穌會在中國：1869 年的江南教區》) 1870 年在巴黎出版，這是目前可知的有關江南傳教區歷史的第一部專著。兩年後，費賴之又以拉丁文撰寫了 *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e Societate Jesu qui a morte S. Fr. Xaverii ad annum MDCCCLXXII evangelio Christi propagando in Sinis adlaboraverunt* (《自聖方濟各·沙勿略逝世至 1872 年在華耶穌會司鐸、修士名錄》)。^⑨除著書外，費賴之還在 *Mission Catholique* (《天主教傳教區雜誌》) 及 *Lettres des nouvelles missions de la Chine* (《中國新教區書信集》) 發表過多篇通信。概因如此，1872 年 8 月，江南教區郎懷仁 (Adrianus Languillat) 主教與耶穌會江南傳教會會長谷振聲 (A. Della Corte) 在徐家匯舉行會議，決定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制定了江南教區進行科學與文化研究的方案，其中第三個方案是：

在費賴之神父領導下研究中國的史地工作，其中包括江南新教區的歷史概況、老傳教士們的傳記；繼續收集感人的信件，重印教區的常年報告書，編寫出版與歐洲及各堂

口通訊的雙月刊，確定繪製江南教區的詳細地圖。^⑩

費賴之神父接受了這一任務。因他已有基礎，又勤力於此，1875年即完成兩卷本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⑪該書記述了1552～1773年間來華的481位耶穌會士，在每篇傳記前，作者提供了所參考的有關每一位會士的文獻書目。在每篇傳記之後，凡會士生前曾留有著作的，附列遺著提要，介紹其中主要內容。這些遺著中，既有宗教方面的，也有天文、地理、數學、歷史、哲學、文學方面的，以及中國古代經典著作，如四書五經等的重要譯著。該書迄今仍是研究明清天主教史不可或缺的資料。方豪神父曾言：“然氏之不朽巨著，應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⑫誠為的論。

擔任纂集後，費賴之為撰寫江南教區歷史，先後到江南教區各堂口蒐集材料，加上在華23年逐日所寫的日記，真實記錄著有關教區及傳教事業的所見所聞，這些史料為其寫作江南傳教區歷史打下了堅實的資料基礎。然而，未及完成，費賴之因積勞成疾病倒。1891年5月，費賴之彌留之際，按照上級的指示，將撰寫江南新教區史的任務交給耶穌會內另一位歷史學家——當時正在蕪湖寫作安徽天主教歷史的夏鳴雷（Henri Havret）神父。夏鳴雷神父將費氏手稿及這批珍貴史料調去蕪湖，殊料5月12日“蕪湖教案”爆發，神父住院、費氏手稿連同這些珍貴史料均毀於大火之中。費氏本人於5月17日在上海病逝，^⑬返回上海的夏鳴雷神父亦在1901年9月29日，因病在徐家匯去世。^⑭撰寫江南傳教史的工作最終未能完成。

1872年8月，“江南科學委員會”確定在由費賴之領銜從事中國史地工作的同時，“決定在高龍鞏神父領導下成立氣象臺和出版科學雜誌，在徐家匯建造一座‘與耶穌會相稱’的天文臺，將氣象記錄和觀察所得編成雜誌，在上海出版並寄往歐洲”^⑮。高龍鞏亦為法國耶穌會士，字鎬鼎，1851年加入耶穌會，1869年1月到達上海。由於來華前高龍鞏曾在斯通赫斯特（Stonyhurst）天文臺學習天文與氣象學，抵華後他首先被派往南京準備建立一座天文臺。但由於南京官府對天主教持排斥態度，在那裡建立天文臺已不適宜，高龍鞏於1870年下半年被召回上海，旋即被派往蘇州傳教。上述決議後，在蘇州傳教的高龍鞏再次被召回上海，籌建徐家匯天文臺。1873年7月，天文臺竣工並正式成立，12月初開始氣象觀測。^⑯依照計劃，高龍鞏編輯出版 *Bulletins des Observations de Zi-ka-wei*（《徐家匯天文臺觀察公報》，又稱《天文月刊》）。1874年，法籍耶穌會士劉德耀（Henri Le Lec）神父被委任為徐家匯天文臺負責人，從此高龍鞏完全轉向傳教，先後被派往江蘇的丹陽、宜興、崇明、海門、南京、鎮江等地傳教，直到1889年被調回上海，在洋涇濱天主堂負責兒童教理班及外籍教友工作。

費賴之去世後，高龍鞏即向上級請求，希望由他來承擔《江南傳教史》的寫作任務。儘管高龍鞏並非史學專業出身，但鑒於此前他曾寫過幾篇報導教區的信件，上級便默許了他的這一請求。當然，高龍鞏主動請纓撰寫《江南傳教史》，除了繼續費賴之神父未完成的工作之外，也希望藉此對其在華經歷作一個記錄和總結。這樣，從1891～1896年這五年的時間裡，高龍鞏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於收集材料和《江南傳教史》的寫作。1896年，“高神父的手稿已編寫就緒並準備付印，可是教區的書刊審查員阻止排版，規定只准按原稿石印，並限教會內部傳閱”^⑰。然而，當高龍鞏將書稿交到光啟社（Bureau Sinologique），編輯審讀後致信高龍鞏，建議原文中“有的最好可以拍成照片”，高龍鞏於是再次投入資料蒐集，最終有74幅照片收入書中，他還把自己的

照片貼在第一卷的扉頁上。1902年，高龍鞏將已完成的前4卷書稿逕寄羅馬耶穌會總會，得到高度評價。受到鼓勵的高龍鞏一鼓作氣，1904年終於完成《江南傳教史》第5卷的寫作。但是，由於高龍鞏未經教區書刊審查員審查，就擅自將書稿寄到羅馬，此舉引起江南教區耶穌會長上的極大不滿，加之高龍鞏寫作《江南傳教史》始終未得到教區的正式許可，這可能是導致《江南傳教史》直至1905年高龍鞏去世仍未出版之原因所在。

高龍鞏去世後，耶穌會長上認為，江南傳教區的歷史不能僅憑一位未經教區任命的“歷史學家”撰寫的“內部傳閱”的《江南傳教史》來向後人交代，應當由一位教會正式任命的具有神學和歷史學知識背景的人重新編寫並刊印一部教區傳教史。1907～1908年，當耶穌會法國省省會長德耀章（Jacques Daniel）神父來江南巡視教務時，許多傳教士向其提出這一請求。據史式徽自言：“省會長就把這項光榮的任務交给了我，我也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使命。”^⑩

史式徽字德甫，出生於法國諾曼底一個舊貴族家庭。在他之前，家中已有過3位耶穌會士。受家庭影響，史式徽先是在耶穌會創辦的勒芒聖十字（Saint-Croix）學校接受教育，後進入巴黎大學，獲文學和歷史學博士學位，並在里昂大學獲神學博士學位。在讀博士期間，史式徽就在各類雜誌上發表了多篇關於歷史研究的理論性文章，多次獲上級褒獎。在教會看來，這樣的知識背景，自然是撰寫《江南傳教史》的合適人選。而且史式徽在此之前從未來過中國，這正可避免像高龍鞏《江南傳教史》那樣“‘過度濫用私人回憶’的弊病”^⑪。

史式徽於1909年來中國，此行唯一的任務就是寫作一部《江南傳教史》，為江南代牧區多年的傳教工作做一個階段性總結。為蒐集資料，據史式徽說：“從1909年9月至1910年8月，我去了北京法國公使館、上海法國總領事館、徐家匯本會會院和總鐸區，查閱了資料豐富的檔案，找到了許多有關史料的原始資料；我也走遍了書中敘述到的各個事件發生的現場，又從活著的證人或當事人的口中，蒐集到許多寶貴的詳細情節。”1910年返回歐洲後，史式徽又“在巴黎外交部，在羅馬傳信部，在歐洲本會各會院所有彙集的文件資料室裡”^⑫，獲得大量資料。依據廣泛查閱的檔案資料，又參考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史式徽開始了其《江南傳教史》的撰寫。

二、兩部《江南傳教史》之內容及特色

高龍鞏《江南傳教史》按歷史時期分為明代、清代前期和清代後期三編，上、中編各一冊，下編共三冊，每冊之間按公元年份來區分。上編即第一冊，從1549年至1643年，敘述明末天主教傳教史；中編即第二冊，從1644年至1840年，敘述清初至鴉片戰爭前天主教傳教史；下編分為三冊，時段分別為1840～1865年、1865～1878年、1879～1898年，敘述鴉片戰爭至義和團運動期間的天主教傳教史。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是從聖方濟各·沙勿略寫起，追溯了耶穌會進入中國傳教的歷史進程，所以上編和中編實為耶穌會在華傳教史。同時，高龍鞏又關注其他修會在華傳教的過程，因此亦可視為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下編則僅限於江南地區的傳教史，以江南教區的主教及其任職年限作為劃分章節的依據。高龍鞏此著與其稱作“江南傳教史”，不如稱作“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更為貼切。

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從1549年寫起，直到1898年，近350年，堪稱一部中國天主教通史。高龍鞏1869年來華後一直住在中國，最早在南京，然後到上海主持徐家匯天文臺建設及觀測，後來又赴江蘇的各個堂口傳教，最後回到上海。長期在華工作的經歷，使他對中國天主教史

上的人物和重要事件有更深的瞭解，因而他的《江南傳教史》中有大量的人物傳記描寫，諸如利瑪竇、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對傳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像沈澹參案（南京教案）、楊光先教難（熙朝曆獄）、“禮儀之爭”、天津教案等都有詳細交代，從中可以看到天主教在中國傳教歷經的艱辛與挫折。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作為耶穌會士的高龍鞏對耶穌會中存在的黑暗面並不避諱，書中對艾爾梅（Faustin Laimé）神父與耶穌會長上的種種不和進行了毫不客氣的影射。諸如此類，使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顯得更加真實全面。

此外，高龍鞏《江南傳教史》收錄了大量插圖及細節描寫。其中插圖多達 341 幅，有些是根據照片繪製，有些則是直接把照片黏貼在書上，他自己的照片被貼在第一冊的扉頁。由於書中所述的許多事件，高龍鞏或是親歷或有耳聞，致使書中有大量的細節描寫。以對“土山灣印書館”的記述為例，高龍鞏在第四冊用了一頁、第五冊用了兩頁，詳細介紹了土山灣印書館的起源是蔡家灣孤兒院的印刷所，甚至提到其印刷的第一本鉛排中文書及第一本西文書的書名。而同樣的內容，史式徽在其《江南傳教史》僅用一段 9 行的文字，說明了兩點內容：一是 1869 年土山灣印書館印書的數量，二是土山灣印書館所印書籍的類型。這些插圖和細節描寫，在當時看來可能顯得有些瑣碎，但誠如論者所指出的，“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中所描述的豐富細節，即使很多無法核實，但依然閃爍著光輝，起碼它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線索，比如蔡家灣孤兒院的平面圖以及其建築用途演變的情況，又比如土山灣畫館奠基人范廷佐修士的作品圖片，還有許多神父的畫像，等等”^⑩。

當然，作為史學著作，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也有其不足之處。首先，高龍鞏《江南傳教史》全書幾乎沒有任何注釋。因為他覺得全部作品都是他自己的創作，出處就是其“私人回憶”。但作為史學著作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陷。雖然後來由法籍耶穌會士逯是道（Henri Doré）神父對全書進行考證，添加了許多注釋及其出處，但仍然有不少地方無法找到文獻來源。

其次，或因缺乏史學的嚴謹訓練，高龍鞏《江南傳教史》有許多傳說或想像的內容。譬如對沙勿略最終未能進入中國內地傳教，高龍鞏認為“這是嫉妒的惡魔挑撥小人的貪忌，阻止沙勿略進入中國。或者可以說，天主不屑用世間的財勢，作為傳佈信仰的工具，更樂於接受沙勿略在中國孤島上以窮困、孤獨，並泰然以其生命作出的貢獻”^⑪。為了表彰沙勿略的聖德，他記述道：

在馬六甲街上，有人抬著一個病死青年的棺柩去埋葬，沙勿略當場命這青年復活，那青年即從棺中起來，沙勿略又命他進入耶穌會“初學院”。赴上川途中，又復活了兩個孩子；海水因沙勿略的祝福，即變成了淡水，使百人得以解渴，一路又始終表現了預言未來的奇能。^⑫

諸如此類，顯然不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所為。史式徽認為，“高神父對史學工作認識不足，核實不夠，引證不確，……加上他這種善良人所有的活躍的想像力，更造成了歷史的失真”^⑬，實非有意苛責。

史式徽的《江南傳教史》，據其導言所述，“寫的是從 1840 年到 1898 年的這一個歷史階段”^⑭。原計劃分三卷，第一卷從 1839 年至 1856 年，第二卷從 1856 年至 1878 年，第三卷從 1878 年至 1898 年。前兩卷經主教批准於 1914 年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第三卷雖已預告，但不知何故，始終未能出版。所以，史式徽的《江南傳教史》實際只有兩卷，敘述了耶穌會傳教士

被徵召重來江南教區傳教的歷史，時間跨度為 1839 年到 1878 年。在結構安排上，“先敘述各位主教任職期間的教區概況，各總鐸區存在的共同問題或對整個教區有普遍影響的事件；其次敘述教區內個別地區的純地方性的事件”²⁶。據此，史式徽《江南傳教史》兩卷各劃分為兩部分：第一卷第一部分為羅伯濟（Bishop Lodovico Maria）主教時期（1839 年至 1848 年），第二部分為趙方濟（F. Xavier Maresca）主教和徐類思（Luigi Celestino Spelta）主教時期（1848 年至 1856 年）；第二卷第一部分為年文思（André-Pierre Borgniet）主教時期（1856 年至 1862 年），第二部分為郎懷仁主教時期（1864 年至 1878 年）。這種以江南主教任職年限作為劃分的依據，顯然是受到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下編之影響。史式徽對這一時期江南教區所涉及的主要問題，譬如與葡萄牙的保教權之爭、教區內不同修會之爭、與新教教會的矛盾、教會潛入內地購置地產、中國的反教運動、教會的慈善事業等，都有詳細敘述。對西方殖民者藉口“教案”干涉中國內政，也有一定程度的揭露。

與高龍鞏主要以自己在華親身經歷、輔以上海耶穌會檔案寫作《江南傳教史》不同，由於史式徽在 1909 年之前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對中國傳教區的情況一無所知，他撰寫《江南傳教史》除主要依賴其查閱的大量檔案外，重要的參考是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因為在史式徽看來，“他的手稿是很齊全的，可以說沒有遺漏一件重要的史料”²⁷。在其《江南傳教史》中，大量引用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以至於有論者指出史式徽《江南傳教史》“係根據另一法籍耶穌會會士高龍鞏（1833～1905）的同名著作改寫而成”²⁸。對此，史式徽本人亦不諱言：

他的著作對於我還是有裨益的，我正不知如何向他表示感謝才好；……他確是我的好嚮導；跟著他的蹤跡，我能抓住並發現許多線索。否則，我對有些事情是難以揣測和想像的。他在“私人回憶”中記述的凡是他親身經歷或親自證實的事情，在本書中我仍多次引用，並給讀者作了一個小注。²⁹

正是因為史式徽大量引用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致使高龍鞏書中敘述不準確的地方也被史式徽沿襲。這裡僅以兩書對基督教新教“弛禁”的敘述為例。高龍鞏在其《江南傳教史》中對此的敘述是：身為教友兼外交官的法國駐華公使刺萼尼（Marie Melchior Joseph de Lagrené）³⁰在與兩廣總督耆英的談判中，採取威懾手段，迫使道光帝頒佈“有利於天主教的諭旨”³¹。1845 年 11 月 2 日，上海道台宮慕久在告示中將耆英奏准的諭旨公佈，並在後面附加了一段話：

現在准許信奉的天主教教徒們在規定的周而復始的日期裡聚集一處，一同欽崇天主，在圖像前向供奉的十字架致敬，還高聲背誦該教經文。這是該教的習慣，所有禮節與以上所述不同者，不能視為天主教。³²

根據高龍鞏的說法，美國聖公會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牧師和英國倫敦會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牧師都注意到諭旨中沒有提及基督新教。文惠廉致信《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發行人：“我無須指出這裡所講的是指天主教，耶穌教人不在內，因為耶穌教人不能供奉聖像或畫像中的十字架。因此他們不能享受佈告中所列的權利。”沒有看到告示具體內容的麥都思則“不相信法國大使沒有要求範圍比此更廣的宗教自由，因而疑心是上海天主教友從道台那裡得到這張告示，要把耶穌教人排擠出去”，“於是他們要求刺萼尼大使正式答覆，並說明當初要求宗教自由是為天主教和耶穌教的。他們沒有得到回信。英國當局亦拒絕干預此事。最後，美國領事福布斯（Forbes）同意把耶穌教傳教士們的要求轉達中國當局”³³。

史式徽在其《江南傳教史》中完全沿襲了高龍鞏的說法：“當刺萼尼公使來上海時，文惠廉和麥都思兩牧師要求公使向皇帝聲明，他的要求既代表天主教也代表耶穌教。但他們沒有得到公使的答覆。英國領事拒絕插手這件事情。最後美國領事福布斯答應為他們向中國官方交涉。”^④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據王慶成先生從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發現的檔案抄件顯示，1845年12月20日（農曆十一月二十二日），耆英給時任英國駐華公使德庇時（Sir John Francis Davis）的回覆照會稱：

現接貴公使來文，因上海地方所出天主教規矩告示，內有不供奉十字架圖像念經即不得為天主教之語，慮恐不供偶像即不保護，聲明於貴國及花旗等國拜偶像等事，業已多年罷止，若異待其門徒，與江南和約不合，請轉諭蘇松太道另出告示等因。……

泰西各國事同一理，斷無異待而不保護之理，貴公使可無堇慮。現已諮會江蘇撫院轉飭蘇松太道另行出示，並諮會閩浙督部堂轉行各口，一體出示曉諭矣。^⑤

據此可知，英國公使德庇時亦曾照會耆英轉達新教教會的請求是確鑿無疑的。而就在耆英回覆德庇時照會的同日，亦覆函美國領事福布斯：

嗣因地方官誤行查拿，有將十字架圖像銷毀之事，遂覆議定，准其供奉。本大臣於各國習教規矩，有無分別，本不知曉，今天主教無論供奉十字架圖像與不供奉圖像，凡習教為善者，皆應免罪。泰西各國事同一理，但係習教為善，中國概不禁阻。至規矩之或異或同，斷無分拒之理。……^⑥

耆英這封覆信的原文被傳教士刊登在當月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國叢報》上。^⑦

既然英國領事也曾就新教傳教權利向耆英提出請求，為何史式徽在《江南傳教史》中的記述卻出現了偏差？有論者認為，“答案之一是書作者不完全瞭解官方內情，答案之二是同長期以來天主教與新教的矛盾有關”^⑧。但筆者認為，史式徽《江南傳教史》對此的記述之所以出現偏差，原因是他參照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所致。至於高龍鞏《江南傳教史》為何出現這樣的偏差，或許是因為兩個“答案”之緣由。

由於史式徽的歷史學背景，他的《江南傳教史》與高龍鞏的相比，就顯得“專業”了許多，不僅在開篇即給出了詳細的參考文獻目錄，而且有詳細的注腳和章節附注。又因為是奉耶穌會上級命令而作，不僅有充滿對上級感謝的前言，而且將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中有違耶穌會一貫著述教會史準則的“不突出個人，突出總體歷史”的大量人物傳記描寫刪去。但這樣做的結果，卻使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簡潔有餘而厚重不足，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以今天的眼光看，與高龍鞏的同名著作相比，史式徽的《江南傳教史》除了在出處上比較嚴謹、語言上比較簡潔之外，從揭示歷史、保存史料等方面來說並不比高龍鞏的著作更好”^⑨。

三、兩部《江南傳教史》之影響

高龍鞏《江南傳教史》因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公開出版，土山灣印書館採用手寫石印出版的法文版，也僅限在教會內部傳閱。二十世紀30年代，還是道神父曾對所有的出處進行考證，他是否有意將其正式出版，未見於史料記載，1931年12月還是道神父遽然去世，出版之事自然已無從談起。儘管如此，其影響仍不容小覷。第一位廣泛引用高龍鞏《江南傳教史》的是史式徽，雖然從專業史學的角度，他對高龍鞏的《江南傳教史》頗有微詞，但史式徽並不諱言該書對其撰寫

《江南傳教史》的重要影響。不僅內容大量採自高龍鞏之《江南傳教史》，全書的結構亦明顯受其影響。徐光啟第十二代孫徐宗澤神父曾留學歐美，獲哲學、神學博士學位，在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面著述甚豐，除主編《聖教雜誌》並發表大量論文外，還著有《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等書，不少資料取自高龍鞏《江南傳教史》。尤其《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正文共368頁（1938年土山灣印書館版），其他的引用不計，長達68頁的第十一章“附錄——中國聖教掌故拾零”，徐宗澤注明是完全取材自高龍鞏之法文本《江南傳教史》。^④藉此可見，高龍鞏《江南傳教史》是徐宗澤撰寫《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最重要的史料來源之一。由於該書乃中國天主教史研究的開山之作，研究者爭相引用，間接擴大了高龍鞏《江南傳教史》的影響。華裔法國天主教學者衛青心（Louis Wei Tsing-Sing）神父著有 *La Politique missionnaire de la France en Chine 1842-1856*（《法國對華傳教政策》）上、下兩卷，在談及自己的研究時，他說：“我不過是沿著前輩以卓越的研究成果為我指明的道路向前進而已。在傳教史研究方面，特別應該提到的是《江南傳教史》的作者，耶穌會士高龍倍神甫。他從事傳教研究，堅持不懈，長達數年之久；他撰書所參考的，全是上海耶穌會檔案中的第一手資料。”^④美國學者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和房兆楹（Chaoying Fang）主編的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明代名人傳》），在為利瑪竇、湯若望等40名來華西方傳教士作傳時，也大量引用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中的資料。^④

1950年代，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整理有關上海小刀會起義歷史資料時，將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下編第一冊第三卷第三章（輔大書坊版為第三冊上冊第三卷第三章）譯為中文。^④據筆者目力所及，這是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中譯之始。改革開放恢復宗教政策後，耶穌會士周士良神父將該書上、中兩編和下編的1879年至1898年間各章譯為中文，但未及完成即去世。2008年9月，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將周士良神父翻譯的《江南傳教史》上編第一冊出版。2009年，輔大書坊以繁體出版《江南傳教史》第一冊，並於2013年、2014年先後出版《江南傳教史》第二冊（上、下）和第三冊（上、下）。至此，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五鉅冊全部譯為中文出版。由於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中包含中國社會政治、外交、文化、語言、歷史等方面的豐富史料，因而它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推動中國天主教史研究，而且對明清時期的中外關係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乃至外交史的研究亦極具意義。

與高龍鞏《江南傳教史》法文版一直未能公開面世不同，史式徽《江南傳教史》因是奉命而作，前兩卷（1839～1878）在1912年甫完成即得以付梓，經主教批准於1914年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正式出版發行，不僅在中國廣泛流傳，法國、美國、德國等不少大學圖書館均有收藏，迄今仍是研究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人在華活動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整理有關上海小刀會起義歷史資料時，也將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二卷關於小刀會起義的資料譯為中文，^④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傳教士對小刀會起義的態度。

史式徽的《江南傳教史》原計劃寫三卷，但最終僅有前兩卷面世，第三卷（1878～1898）始終未見出書。據筆者推測，第三卷要麼根本沒有動筆，抑或僅完成部分。因史式徽1912年即再次被派來中國，藉此可知他寫作《江南傳教史》的時間，最多也僅有兩年。這麼短的時間能寫出兩卷，縱有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作為參考，亦不能不說是神速。可能是為了完成既定的寫作計劃，以彌補遺憾，重返中國後的史式徽，在從事教學、編輯刊物等事務的同時，注意蒐集資

料，終於 1925 年在土山灣孤兒院印書館出版 *La Nouvelle Mission du Kiang-nan, 1840-1922*（《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 1840～1922》）。^④全書記述耶穌會恢復後重返江南地區活動的情況，始於 1840 年鴉片戰爭、耶穌會在上海獲得傳教自由，迄至 1922 年羅馬教廷依省界分江南為兩教區，於安徽另設主教。全書以先後管理江南教務的幾位主教為階段劃分依據，第一至四章依次為羅伯濟（任期 1839～1848）、趙方濟（任期 1848～1885）、年文思（任期 1856～1862）和郎懷仁（任期 1864～1878）四位主教，與《江南傳教史》1914 年出版的前兩卷相當。第五章題為教務進展（1878～1923），敘述倪懷綸、蘇繼章、姚宗李主教時期教會向安徽、徐州、海州發展，以及開辦醫院和震旦大學等情況，因此可視為其《江南傳教史》之續篇。同時，因自己的《江南傳教史》記述始於 1839 年，可能是為了比肩高龍鑿，史式徽又撰寫了 *Les anciennes missio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Chine, 1552-1814*（《耶穌會在華的早期傳教事業，1552～1814》），1924 年在上海出版。^⑤該書敘述了自 1552 年聖方濟各·沙勿略去世至 1814 年羅馬教皇庇護七世宣佈耶穌會恢復期間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歷史，連同其《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史式徽實際上亦完成了一部名副其實的中國天主教史。

改革開放後，史式徽的《江南傳教史》由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成中文，由中國籍神父丁宗傑統校後，1983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時，鑒於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的第三卷始終未出書，譯寫組將史式徽的 *La Nouvelle Mission du Kiang-nan, 1840-1922* 的第五章《教區的進展（1878～1922）》摘譯為中文，作為《江南傳教史》的附錄。由於史式徽在敘述“教區概況”時，也談及地方政治，反映當時江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情況，因而該書對晚清時期中外關係史、江南地方史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史料。

史式徽藉撰寫《江南傳教史》，一生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1912 年，他向耶穌會長上“請求正式來華為傳教士”^⑥，由於當時大修院缺乏講授宗教史的教師，他的請求獲得批准。重返中華大地的史式徽，除在大修院講授宗教史和神學課程外，還被聘為震旦大學法學院教授，講授外交史與法國文學史。^⑦史式徽在中國的教學生涯，可謂碩果累累，僅就其在震旦大學的教學而言，“江南教區國籍四分之三皆曾列門牆，至於震旦舊生中現在各處各地外交機關或領事館者，當仍能回憶在昔日政治史之史教授云”^⑧。而他在大修院教過的學生金文祺，不僅成為一位勇於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愛國神父，而且在大修院修讀期間即將史式徽的 *La Nouvelle Mission du Kiang-nan, 1840-1922* 譯為中文。^⑨除教學外，史式徽從 1913 年開始負責編輯《漢學叢書》（*Variétés sinologiques*）。《漢學叢書》是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一套有關中國歷史、地理、文學等為主題的叢書，從 1892 年出版第一卷，到 1938 年出版最後一卷為止，出版時間長達 46 年，其出版品在西方漢學界影響深遠，許多作者因此榮獲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史式徽主編《漢學叢書》長達 10 年，因其嚴謹的態度，使出版質量大大提高。從 1914 年起，他又主編 *Nouvelles de la Mission*（《江南傳教區新聞》）長達 22 年，可能為了表彰他對該報的貢獻，後世以其中文姓氏將該報譯為《史報》。此外，他撰寫的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864-1914: son histoire, son état présent*（《土山灣孤兒院：歷史與現狀》）1914 年由土山灣印書館出版，雖然只有薄薄的幾十頁，“但它卻是唯一公開出版、探尋揭示土山灣孤兒院歷史淵源和生存現狀的專著。……比如柏立德的《土山灣檔案》，原件早已散佚，若不是史式徽的引用，後人可能根本無法瞭解這些檔案的內容”^⑩。

總之，無論高龍鞏還是史式徽之《江南傳教史》，均成為我們今天進行中國天主教史、江南地區歷史及相關研究的重要資料，此誠可視為傳教士對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實質性貢獻之一。

①關於這兩種文獻的詳細討論，請參拙文《〈天學傳概〉同名異文考論》，載孫江等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②雖然中文譯名均為《江南傳教史》，但法文書名稍有不同：高龍鞏撰寫的原書名為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史式徽撰寫的原書名則為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Jésuites de la province de France (Paris), 1840-1899*，直譯為《耶穌會法國巴黎會省在江南的傳教史，1840～1899》。

③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上編第一冊，周士良譯，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8年，前言第1頁。

④就筆者所見，關於這兩部書的討論，僅有張曉依的兩篇論文：《同名雙姝——高龍鞏與史式徽的兩本〈江南傳教史〉的背後》，載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編：《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8～341頁；《高龍鞏和他的〈江南傳教史〉》，載張偉、張曉依：《遙望土山灣——追尋消逝的文脈》，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93～198頁。

⑤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何兆武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74頁。

⑥長期以來，國內外學界均將羅主教的名作“羅文藻”，字“汝鼎”或“我存”，生卒年為1616～1691。而據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羅主教墓誌銘，羅主教名應為“羅文炤”，字“宗華”，生卒年為1617～1691。見宋黎明：《天主教第一位國籍主教羅主教之名、字與生日的新發現——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羅文炤主教墓誌銘之初步研究》，載朱慶葆、孫江主編：《新學衡》，第一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⑦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9頁。

⑧⑨張曉依：《同名雙姝——高龍鞏與史式徽的兩本〈江南傳教史〉的背後》。

⑩ Joseph de la Servière, *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e Societate Jesu qui a morte S. Fr. Xaverii ad annum MDCCCLXXII evangelio Christi propagando in Sinis adlaboraverunt,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873.

⑪⑫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二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206～207頁。

⑬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原序”第10頁。該書1897年曾出版石印本，1932年和1934年出版鉛印本上、下兩冊，1936年馮承鈞將其譯為中文，題名為《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⑭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645頁。

⑮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原序”第1頁；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馮承鈞譯，“緒言”第3頁。

⑯Henri Cordier, “Henri Havret”, *Toung Pao*, 2.2 (1901), p. 387.

⑰王錢國忠：《風雲歲月：傳教士與徐家匯天文臺》，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12年，第67頁。

⑱⑲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原序”第1頁。

⑳㉑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原序”第2頁。

㉒⑳㉓張偉、張曉依：《遙望土山灣——追尋消逝的文脈》，第196頁；第201頁；第200頁。

㉔⑳高龍鞏：《江南傳教史》，上編第一冊，周士良譯，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8年，第4頁。

㉕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原序”第1～2頁。

㉖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第3～4頁。

㉗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原序”第3頁。

㉘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

區史料譯寫組譯，“出版說明”，第1頁。

⑩刺萼尼也譯為“拉萼泥”、“拉萼尼”。

⑪⑫⑬⑭高龍聲：《江南傳教史》，第三冊上冊，張廷爵譯，新北市：輔大書坊，2014年，第90頁；第93頁；第94頁；第96頁。

⑮史式徵：《江南傳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第81頁。

⑯轉引自王慶成：《清代西教在華之環境——康雍乾嘉道朝若干稀見文獻考釋》，北京：《歷史研究》，1997年第6期。

⑰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 589.

⑱郭衛東：《轉折：以早期中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為考察中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8頁。

⑲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8年，第368頁。

⑳衛青心：《法國對華傳教政策》，上卷，黃慶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緒論”第10頁。

㉑富路特、房兆楹主編：《明代名人傳》(*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1~6卷，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

㉒⑳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74~924頁；第925~933頁。

㉓ Joseph de la Servière, *La Nouvelle Mission Du Kiang-*

Nan (1840-1922), Chang 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Orphelinat de T' ou-Sè-Wè, Zi-Ka-Wei, 1925, pp. 50. 也有論者主張該書初版於1923年，見史式徵：《江南傳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出版說明”，第1頁；江慶柏主編：《江蘇地方文獻書目》，下冊，江蘇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第1190頁。然筆者目前所見最早的版本為1925年版。

㉔ Joseph de la Servière, *Les anciennes missio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Chine, 1552-1814*,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1924.

㉕㉖《上海震旦大學名教授史司鐸逝世》，北平：《公教學校》，1937年第3卷第3期。

㉗《震旦大學職教員姓名錄》(1934年)，上海：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檔案館藏。

㉘關於金文祺神父的傳教業績、反抗日寇侵略及翻譯《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La Nouvelle Mission du Kiang-nan, 1840-1922*)等，擬另撰文詳加探究，此不贅述。

作者簡介：譚樹林，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 210046

[責任編輯 陳志雄]